

王夫之学行系年



刘春建

古籍出版社

王夫之学行系年

刘春建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王夫之学行系年

刘春建 编著

责任编辑：王 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新华一厂印刷厂印刷
850×1162毫米 32开本 10.75 印张 249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7-5348-0087-0/K·15 定价：3.90 元

序

王船山（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的各个领域都提出了超越前人的创辟见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哲学学说是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最高峰。他对于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理论成就是光辉的、卓越的，至今仍值得赞扬。

王船山不但在理论思维上有宏深的成就，而且人格崇高、品德卓越。他坚持民族气节，始终不渝。清初坚持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不少，如黄梨洲（宗羲）、顾亭林（炎武）、傅青主（山）、李二曲（颢）等，虽然都不肯出仕，但都屈从了薙发令，这也是不得已而然，不必苛求。惟王船山藏匿于深山之中，不肯薙发，竟“完发以终”。他志行卓绝，超越了一般学者。

王船山著作甚丰，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可以从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的思想内容中看出来。研究船山思想的发展过程，对于他的各种著作的先后次序必须作一番详密的考证。这对于王船山哲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刘春建同志研究船山著作多年，近来就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王夫之学行系年》一书。此书系统地论述了王船山一生的行踪和他的哲学体系，并按照船山著述的先后次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船山著述的基本内容。书中依据“知人论世”的原则叙述了船山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家庭环境与家学渊源，揭示了船山哲学思想

的突出成就，同时也指出其思想局限，力求对船山学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书中对于王船山的生平大事、著述年代以及其中的疑难问题都进行比较充分的考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全书取材丰富翔实，文笔生动明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我认为，这是关于王船山的一部有价值的新著，是王船山思想研究的新成就。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1987年12月5日

前 言

在人类进程的重要关口，有这样一些杰出人物，他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人类的智慧就在此时此刻会放射出璀璨夺目光照千秋的奇丽火花。王夫之就是这样的一位杰出人物。这个巨人的脚印，踏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文明史坎坷泥泞的路上。

王夫之生当我国明清之际，他三十三岁那年，愤而辞去南明小朝廷行人司行人官职，历经艰厄，隐居僻壤，潜心著述，至死不辍。为了探索明朝败亡的原因，寻找民族复兴的真理，他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达四十年，“夙志不辍，用力不懈”，以犀利的笔锋写下卷帙浩繁、观点独到、内容深湛的著作。他既立足于对现实的概括（包括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诸方面），又洞察中国古代思想繁演，以“坐集千古之智”的博大胸怀，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伟气魄，以“伸斧钺于定论”的历史总结精神，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优秀成果（肯定的否定），系统扬弃和清算了历代唯心主义并改造和利用了其中某些合理内核（否定的肯定），从而别开生面地形成了自己富有批判性、斗争性、总结性和求实、求新、求真精神的理论体系，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起了奠基石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是华夏文化的皇冠，那么王夫之思想则是这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他的八百多万字著作犹如一座矿藏，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发掘和继承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对于“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都是“有重要帮助的”。

然而，对一个思想家尤其是象王夫之这样的大思想家来说，挖掘其思想宝库中的许多“珍品”，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梁启超就曾经说过：“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轴绎后，不能见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实还不尽然，“知人论世”，哲学史研究不能停留于弄清楚一个哲学家说什么（这是基本的），而应该进一步阐明他为什么这样说，即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亦就是说，要全面把握王夫之的治学蹊径、理论贡献及思想特色等，除了必须精读他那一百多种、四百多卷的著作以外，其生平经历、文化素养、家庭环境、历史条件（全方位的）等诸方面的因素都是不能忽视的。

我是从1979年开始研究王夫之的。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比较详细完整地评价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史上这样一位巨人，我在阅读、思考和写作（数易其稿）过程中是有些粗浅体会的。我研究和撰著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以史为经，以论为纬，史论结合，经纬交织，相得益彰，互为发明。为了阐明王夫之思想是他自己特定时代的产物，我尽量将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王夫之所生活的时代特征是：封建社会及其统治思想已经走到马克思所说的尚未达到“崩溃时期”，但已“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8页），诚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个“地

坼天乖”的时代。正是明末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总危机的大爆发、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及明清王朝更迭中社会大动荡的现实，把王夫之这样一个卓越人物呼唤到历史舞台上来。据此，我在概括这一历史背景时，力图贯串反映当时社会诸矛盾相互纽结的一条红线，以突出时代主题，而不至于自然主义地照录一些琐事碎闻，亦避免在汗牛充栋的史料面前茫然无措，如堕烟海。进而，从广阔的背景逐步浓缩到社会思潮，最后集中到王夫之本人的生平及思想。王夫之所以成为王夫之不是偶然的，既是当时经济、政治、思潮发展的产物，又与他生平的特殊经历分不开。关于王夫之的生平系年，我参照前人编写的有关年谱和我导师肖蓬父先生编写的《王夫之年表》（肖教授对我写作此书曾热心指点，并将当时尚未发表的“年表”供我参考。此年表后来发表在《求索》1982年增刊上。特此说明），窥其大略，抉择爬梳，精心辑录，力求论证王夫之在发奋求学时期不是只知墨守古训、拘谨迂腐的秀才举子，而是在走着读书、应试、出仕老路的同时，忧国忧民，不满于腐败的朝政，有志于社会弊端的改革，在十年政治生涯之时也不是盲目忠君“从王”、沉溺于“党争”的官迷政客，而是以反民族压迫斗争的大局为重的有识之士；在隐居著述的后半生更不是看破红尘、悲观厌世、逃避现实的“槛外人”，而是关心时势、辛勤耕耘、“欲尽废古今之虚妙而反之实”（王敌《姜斋公行述》）的哲学旗手。关于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我亦尽可能广征博引，试图说明王夫之的思想路线并非象曾国藩所谓“本朱子而讹异端”（《船山遗书序》），而是博采众长、独放幽馨——前期以《易》、《老》并宗，后期以《易》统《老》，独宗张载；其著述基本风格是：否定陆王、批判佛老、改造程朱、淹贯经史、扬弃百家、推陈出新。在行文体例上，我按其著述活

动程序（有些著作成书时间不详，遂予以扼要考定）分别作出评介，每一本书的内容提要（有的是本人的管见，有的则适当采纳海内专家有关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不便一一注明。在此，谨向有益于我的师长鸣谢）均附于系年的注释之后；在依据其政治活动和学术路数的历史转折所划分的每一阶段前，我都辅之以简明的综述，藉以交待王夫之在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及时代、思潮、其他人物的概况。这样夹叙夹议，分析与综论相结合，承上启下，俨然形成条贯，而显示出王夫之生平及其思想演进的客观轨迹和基本脉络。

其次，“上联下挂，左顾右盼”，纵横比较，寻找方位，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宏观座标系中，去把握王夫之思想的微观特征。具体做法是：（一）与对立面比较。王夫之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其主要对手则是包括程朱陆王都在内的宋明理学，以及它重要的理论渊源——佛老思辨。在进行比较时，我力图从异中辨同，同中察异，而以把握“异”为主，由此展现王夫之思想的发展史就是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斗争的历史，是大破大立、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历史。（二）与持同观点的思想家比较。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通过将王夫之与荀子、王充、张载、王廷相等前辈唯物主义哲学家比较，来看他对古代唯物主义宝库的极大丰富；另一种情形是通过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同辈学者比较，来看他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所起的哲学先锋作用——顾、黄、王、方等既有共性，即不约而同地都举起反理学的大旗；同时又有各自的个性，即顾氏长于经学，黄氏长于史学，方氏长于“质测之学”，而王氏则长于哲学。通过纵向和横向这样全方位的比较，王夫之思想的特点了然若揭：批判性——矛头所向直指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封建

罗网，总结性——凡前人所探讨过的哲学问题，都予以不同程度的重新考察，凡前人所达到的理论终点，都予以这样或那样的向前推进；创造性——注重利用“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的先行资料，但没有囿于传统观点，而是将其放到自己的思想熔炉里加以冶炼而自成机杼；一贯性——较自觉地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并力图贯彻到学术各个领域；从而凝炼成以“返之于实”的世界观、“趋时更新”的方法论、“因时之极弊而补救之”的社会改革方案、“善动化物”和“乐观其反”的人生观为主体的彼此呼应的理论体系；求实性——这不仅表现在对唯心主义哲学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通过“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以化腐朽为神奇）上，更反映在著述的宗旨是经世致用方面。正是借助比较法的功能，才了解到王夫之启蒙观点的萌发。

再次，抓住作为王夫之哲学体系的主导范畴，并找出支配其整个哲学系统的基本问题及其独特表现形式。哲学的形态表现为哲学范畴的发展和演变。每一哲学形态有起主导作用的范畴，并围绕它而展开着一个体系。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应该探寻出作为认识之网上纽带的主导范畴。抓住了这一环节，也就抓住了哲学发展的纲要。诚如列宁曾指出的：“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在王夫之那里，哲学基本问题是“天道”和“人道”的关系，理论核心是“贞天道而尽人道”。这个理论核心决定了王夫之哲学形态展开的显著特点，既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意志论针锋相对，又与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宿命论截然相异。围绕如何尊重天道、发挥人道的问题予以缜密的哲学规定，也就构成了王夫之哲学多彩多姿、催人进取的本质内容。

最后，运用矛盾分析法来剖析王夫之哲学思想的二重性，尤其是从发展的角度去研究王夫之在不同时期对哲学思想的不同表述。王夫之哲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今日之我”逐步克服“昨日之我”的动态系列中臻于成熟的。如果不分清王夫之思想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的上升过程中诸层次、结构及阶段，只是一刀切地将其他不同时期的表述都视为代表作，就非但不能客观地把握其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客观风貌，且会引出许多各持一端的争论来。如有人认为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后继者，有人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种严重分歧就与忽视王夫之思想的发展，要么抓住其早期的观点或要么抓住其晚期的观点来范围全过程不无某种联系。持王夫之为理学家论者，似只注意到王夫之早期沿袭程朱理学颇多，即使在思想路线上不得不与程朱学派交锋，也往往采用批判“朱门后学”的形式来间接指斥朱熹（至于陆王心学及佛教、道家，王夫之一开始就予以猛烈抨击而毫不留情）；持王夫之为理学的彻底反对派论者，也可能仅注意到夫之在晚期公然声明不惜“得罪于先儒”，甚至指名道姓地斥责“程子”“朱子之过”，再三强调对包括程朱学派在内的各种唯心主义流派“伸斧钺于定论”，作出历史的判决。正是基于上述，我在研究时着眼于王夫之思想自我否定之否定的前后演变，以发现哪些属于全局性的观点，哪些属于局部性的观点；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哪些是突出贡献，哪些是严重局限，从而尽可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中肯评价，防止在叙述时任意拔高或任意贬低的主观主义作法。此外，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如同任何新的学说那样，其根源虽然深藏于物质的经济事实中，但是它必须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正由于它有先驱者流传下来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和进一步改造的前提，才与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有着内在联系并显示螺旋

式上升的规律性。因此，要了解王夫之哲学的本来面目，还须将其纳入到整个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链条中去，以揭示其源流及其在大动态系统的特殊位置。

我写作此书，虽朝夕奋勉，反复斟酌，七载方成，但由于本人学识甚浅，才思弩钝，加之王夫之哲学体系博大精深，非几代人共同努力不足以驾驭，故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庆幸之情，不敢愧许之心，若能抛砖引玉，得到读者教正，本人将受益非浅。

在研究王夫之思想和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肖箴父、唐明邦、李德永三位导师的谆谆教诲；当年9月以此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得到方克立、李锦全等教授的关心和指点，又承张岱年先生题签赐序，蒙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使拙著得以付梓，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此乃拙著撰述之动因也。

刘 春 建

1987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屡试求仕属意科举 潜心读书留心政务

——1619年至1642年科举求仕的青少年时期 …… (1)

第二章 出入险阻投笔从戎 抗清失败精研《易》理

——1643年至1653年的十年政治生涯 …… (32)

第三章 湖南流亡体察民瘼 痛定思痛反刍国学

——1654年至1657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 (62)

第四章 志未酬悲歌归山涯 勤著述反虚务求实

——1658年至1670年归隐衡阳后的活动著述 …… (117)

第五章 “三藩之乱”数载泛宅 风尘仆仆非“避滇氛”

——1671年至1678年图谋举事的行踪 …… (209)

第六章 刻志兢兢经世致用 “残灯绝笔”更尚“峥嵘”

——1679年至1692年的“希张横渠之正学” …… (242)

附录一 船山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312)

附录二 王夫之家族系表

第一章 屡试求仕属意科举 潜心读书留心政务

——一六一九年至一六四二年科举求仕的青少年时期

王夫之出生的时代，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已步入它的末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形成，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无穷的贪欲，竞相疯狂地兼并土地，对农民实行空前野蛮的掠夺。据《明史》记载，仅弘治十五年（1502）与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比较，税田总额便由850多万顷降到422多万顷，减少过半。这说明许多耕地被少数皇室特权阶层所垄断，不再纳税了。但是明政府的田赋税收总额不仅毫无减少，而且任意提高剥削率，仅田税一项就由万历时239万余两猛增到崇祯时的1670万两。此外更有“剿饷”（用于镇压农民军的饷银）、辽饷（用于与后金在辽东进行战争的饷银）和“练饷”（明政府的军队屡次被农民起义

军歼灭，企图挣扎，又抓丁练兵，并苛派赋税作为练兵的饷银）的追加。再加上当时朝廷政治极端腐败黑暗，任阉党专权，纵厂卫横行，地方土豪劣绅敲榨勒索，导致“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①，有以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者，甚而人相食，以致到处“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②。农村经济的濒于崩溃和农业生产力的严重萎缩，迫使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四方流亡，于是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了；15世纪后半叶及整个16世纪，反封建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声势浩大。

明代自嘉靖以来，农业因封建剥削的惨重而陷入危机，城市工商业却因涌入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有所发展。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开始了经济关系的新变动。资本的增殖，在社会两极分化中逐渐展开；商业资本的竞争，为新生产方式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而工匠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出现。据《明神宗实录》等记载，在万历年间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尤其是东南地区的纺织业），逐步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在苏州甚至“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虽然当时总的说来，全国还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然而江南等一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却不能不是促进封建社会解体的催化剂。由于新的生产方式要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封建统治的崇本抑末政策却对它实行种种限制，扼杀新经济的萌芽和市民的生路，因之，新兴市民（包括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和中小工商业者）也逐渐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敌对势力。特别是当嗜货成癖的神宗皇帝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派遣由宦官充任的矿监、税使四出横征暴敛，进行大规模的搜括之时，更激起全国各地市民的强烈反抗。万历末年，江苏、浙江、湖南、

湖北、江西、云南、河北、山东等地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数十次市民暴动，规模最大的达十余万人。这样一来，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封建斗争的洪流，便与以往不同而涌入了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呼应的新兴社会力量，使得明末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带上了某些新的特点。

不仅如此，明政府与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也时常发生，特别是自万历十一年后，关外建州女真崛起。女真贵族利用明王朝的政治腐败，开始武装割据，建立了后金政权，并多次伺机深入关内掳掠人畜，甚至频频进逼京畿。然而明朝统治者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却或明或暗地与女真贵族勾结、妥协，使其气焰日张，逐渐成为明王朝的威胁。由于中原地区汉族人民面临着民族征服的危险，整个社会更趋于动荡不安。

此外，大江南北烈焰震天、长城内外烽火弥漫的紧张气氛，尤其是明王朝统治者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空前危机，促使地主阶级内部发生政治分化。一部分在野的开明地主及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借以文会友之名纷纷结社，相聚讲学论政，针贬时弊，抨击阉党，要求改革现状以挽救危局；其中以东林党及继之而起的“复社”的影响为最。在明末特定的条件下，地主阶级内部特别是中下层的政治革新派反对当朝腐朽集团的斗争，不仅是当时初露端倪的进步思潮所依存的主要社会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折射了农民主张均田免赋、市民争取平等权利以发展自由经济的愿望，因此亦使当时错综复杂、相互纽结的社会矛盾增加了某些新的政治内容。

这确实堪称一个充满火和剑、血和泪的时代。诚如明末进步思想家吕坤所生动形象描述的：“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③。腐朽没落的明王朝已

处于危机总爆发的前夜，以李自成为首的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正在蕴酿着。

生长于在野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家庭的王夫之，正是置身于上述种种矛盾斗争的旋涡之中。他从小就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教养，“少负俊才”、“颖悟过人”^④；稍长，勤勉好学，七岁读十三经，十四岁中秀才，十六岁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对廿一史亦靡不淹贯。不过，他的学习兴趣远不只在书本上，颇注重实际考察，“自少喜从人间问世方世，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⑤，力求经世致用。青年时期的王夫之更是风神俊朗，一方面眷恋着读书、应试、出仕的科举旧路，另一方面则关心动荡的时局，对国家境况的忧虑惆怅溢于言表。是时，高迎祥、张献忠等十三家农民起义军会师荥阳，声势大震；满洲八旗军直入山东、济南一带烧杀抢掠，朝野皆惊。为“匡时救国”，拯救社稷，王夫之与一批热血文友先后组织“行社”、“匡社”、“须盟”等组织，立志改革社会。在求学求科举之时，他写了不少诗作，虽大都亡佚，但透过若干残剩的诗篇，仍可大致领略其倜傥不羁的精神风貌，不难看出他并非迂谨平庸的秀才举子，而是注目时代脉搏的忧时之士。不过，此时的王夫之没有亦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把摆脱“内忧外患交迫”时局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身上，并渴望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来获得“天人如献策”^⑥的机会，幻想跻身上层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方期收国士，益用广皇仁”^⑦。可是，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深重，他的理想与现实愈来愈矛盾。